

## 澳門教育百年發展歷程的史實重構 ——讀鄭振偉《百年樹人：清末以來的澳門教育》

雷思雨 龔陽

澳門作為中西文化交流之最早門戶，乃西方現代教育傳入中國之先導地區。早在 1571 年，也就是澳門開埠十幾年後，羅馬公教的耶穌會士便在澳門創辦第一所學校——聖保祿公學。此校乃遠東第一所教會學校。<sup>①</sup>故此，澳門毋庸置疑成為中國土地上實行西式教育歷史最久之地。

澳門回歸前後，澳門教育史研究伴隨澳門學的蓬勃興盛而漸趨成為學界熱點，新著迭出，成果宏富，且迄今方興未艾。澳門大學教育學院鄭振偉副教授便是該領域研究之執着耕耘者與成就卓著者。他的新著《百年樹人：清末以來的澳門教育》（以下簡稱《百年樹人》），<sup>②</sup>對清末以來一百多年澳門教育發展史上若干典型個案予以史實重構和細節探析，極大地拓展了澳門教育史研究的廣度與深度，被視為“可傳諸久遠的教育歷史專論”與“藏諸名山的教育史著作”<sup>③</sup>。

鄭振偉教授曾採用報章、期刊、政府憲報、學校校刊、各種檔案等文獻史料，研究 20 世紀 40 年代的澳門教育，撰著《1940 年代的澳門教育》。<sup>④</sup>《百年樹人》是他對前作研究時間範圍的“向前延伸”和“往後發展”，構成立體而系統的敘事。新書分別對清末民初澳門本土教育活動、粵澳童子軍課外活動、培正青年會學生自治活動、澳門培正中學早期發展、20 世紀 40 年代廣大澳門附校、澳門同善堂義學早期發展、20 世紀澳門師範教育、澳門中國語文師資培訓等頗具代表性的專題逐一予以文獻考證和史實探究，並以點帶面、點面結合，重構清末以來一百多年澳門教育發展的歷史圖景。同時，作者還對 20 世紀 90 年代以來的澳門教育研究歷史與現狀予以清晰梳理和深度論析，為未來的澳門教育研究奠定了堅實的文獻基礎。

《百年樹人》之所以被視為能“傳諸久遠”、“藏諸名山”的著作，無疑與其呈現出的鮮明研究風格息息相關。具體而言，該書的研究議題、研究方法、文獻使用與理論闡釋均可圈可點。

第一，研究選題注重開創性。《百年樹人》以清末以來一百多年澳門教育發展史上的若干典型個案為着眼點，分別對相關議題展開史料爬梳、文獻考證和史實重構，並深入闡

作者簡介：雷思雨，暨南大學文學院博士研究生（通訊作者）；龔陽，澳門大學教育學院副教授、博士。

①（葡）施白蒂（Beatriz Basto da Silva）：《澳門編年史》，小雨譯，澳門：澳門基金會，1995 年，頁 17。

②鄭振偉：《百年樹人：清末以來的澳門教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4 年。

③單文經：〈序〉，鄭振偉：《百年樹人：清末以來的澳門教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4 年，頁 1。

④鄭振偉：《1940 年代的澳門教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 年。

析各研究個案在澳門教育歷史上的地位。作者所選的個案，既為深刻影響澳門教育發展歷程之重大事件，亦涉及前人甚少關注或語焉不詳之重要議題。

其中，該書第一章〈華洋並存：清末民初澳門本土的教育活動〉便系統地探討了這一時期的澳門本土教育。此乃澳門教育史上之重要轉折，對澳門社會發展亦具有深刻影響。然而，過往卻罕有學者觸及該議題。作者在梳理大量中外文獻史料的基礎上，從“非華人辦理的教育”、“華人辦理的一些學校”、“華人學界的一些活動”、“華人學校的監管”、“男女同校問題”等方面，首次全面還原這一時期澳門教育的整體狀貌。通過詳實的考證，作者認為，其一，晚清時期的華人教育雖仍承襲中國傳統的義學和私塾制度，且使用《三字經》和四書五經之類的教材，但教育制度的改革和政局的變化也影響着澳門學校的發展。其二，維新派人士和同盟會人士此期均曾在澳門活動，促成蒙學書塾、原生學堂、啟明學校、華商學堂、培基兩等小學堂等相繼出現，開啟學校採用中西兼備新編教材之風。故此，維新、同盟人士對推動澳門教育發展發揮過一定的作用。其三，澳門學界在 20 世紀初期開始參與社會活動和政治事件，諸如學界的賑災、剪髮不易服運動、男女同校等，教育開始對澳門社會產生影響。其四，澳葡政府在 20 世紀初開始關注華人辦學的動向，並頒佈相關管治條例，對華人興辦教育有一定的積極意義。其五，澳葡政府雖然為土生葡人和華籍兒童提供葡文教育（即所謂的公共教育），但實則側重於顧及土生葡人謀生之需；天主教學校也為不少窮困華人家庭學生提供教育機會，而實施的同樣是葡式教育。

該書第七章〈百年師範：澳門師範教育的軌跡〉也開創性地勾勒出澳門師範教育的歷史脈絡。作者從“中國師範教育的發軔”、“師範制度確立前後澳門的教育改良”、“澳門及從內地遷澳的師範學校”、“20 世紀 50-70 年代的師範教育”、“澳門政府對師範教育的資助”等方面，對澳門師範教育的百年歷程予以細密考證和梳理辨析。其一，作者通過對 20 世紀初澳門學塾負責人學歷和籍貫的考證，推斷出澳門早期的師資與內地乃一脈相承。其二，作者嘗試從中國師範教育發軔之始，追蹤以清末民初教育家陳子褒（1862-1922）為中心的蒙學會的教材和教學改良活動，進而考證陳子褒弟子在澳門辦學的史實。其三，作者搜覓政府規章，釐清澳葡當局與澳門師範教育發展之內在關係：澳葡政府在 20 世紀 20 年代開始規管由華人辦理的私立學校時，規定設立小學者，校長須具備初中畢業資格或擁有小學任教的資歷，設立中學者乃以“師範”作為教員的條件選項，而設立師範學校者，則校長和教員必須是師範畢業或擁有在師範學校任教的資歷。其四，作者認為澳門師範教育的形成與發展源於 20 世紀上半葉內地學校的遷入，而澳門本地較早的一所師範教育機構是聖羅撒女子中學培養小學教師的高中師範部。澳門師範教育的具體發展脈絡是：抗日戰爭期間，內地一些附設師範科的中學遷澳辦學，部分甚有規模——此時期可視為澳門師範教育之真正開端。1949 年前後再有內地學校遷澳，澳門出現高等院校開辦的師範課程。澳葡政府曾於 1965 年為葡語教師開設一所師範學校，但因辦校思想因循守舊，以致長期培訓和一些研究澳門具體實際教學的計劃無法付諸實踐。20 世紀 80 年代，澳葡政府開始

積極關注本地教育，參與私立學校辦學，對提升師資水平起到促進作用。其五，作者指出，澳門回歸迎來師範教育發展的高峰。回歸前後，澳門教師的培訓工作主要依靠政府以協議的形式提供資助。1989年澳門大學教育學院的成立，開啟了澳門師範教育的全新篇章。至此，澳門本地高等院校開始真正承擔培訓中學、小學和幼稚園等各級教師的責任，促進教師的成長並提升教師的專業地位。

該書研究的其他議題同樣頗有新意，而且涉及重要學校的個案研究。對歷史個案的分析考證，是深入瞭解澳門教育發展史的基石，為作者的脈絡構造和理論分析奠定了堅實的史料基礎。

第二，研究方法注重實證。《百年樹人》研究的議題涉及教育學、歷史學、政治學、社會學、宗教學、文獻學、統計學等方面，所以作者運用的研究方法豐富多元。總體而言，作者的研究始終以實證為核心，特別是將文獻考證、數據統計、個案分析運用到爐火純青。作者對每一個議題的研究都盡量從檔案文獻入手，將原始史料細緻整理，仔細甄別，並做到各種史料之間的相互參酌與彼此校正，故能讓敘事與闡釋“持之有故，言之成理”。

文獻考證是《百年樹人》研究的首要基石。作者研究每個議題，均從文獻搜尋着手，通過不同來源、不同語言的史料，構築還原史實的“鐵證”，得出令人信服的結論。以該書第二章〈課外活動：廣東和澳門的童子軍活動〉為例，作者在探討童子軍的教育功能時，先後引用《新青年》1917年所載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和康普（G. S. F. Kemp）的〈中國童子軍〉、〈童子軍會報告〉，《清華學報》同年所載聞一多、時昭涵的〈童子軍〉，以及《申報》1920年所載署名為“行知”的〈中華童子軍之經歷與前途之希望〉，以闡明“童子軍的教育功能”。<sup>①</sup>然後，作者引用時人陳鴻儀〈母校童軍肇始之史實〉一文，明確指出設立童子軍的宗旨，乃“提倡及養成兒童具有智、仁、勇之精神，兼訓練初步軍事學識”。<sup>②</sup>最後，作者引用《廣州民國日報》1925年5月3日附刊所載吳榮煦的〈童子軍教育的效能〉一文，更進一步證實童子軍的教育功能。<sup>③</sup>作者的文獻考證環環相扣，步步深入，最後以“鐵證”構築“鐵案”。

數據統計是《百年樹人》研究的堅實依據。該書自始至終運用從大量檔案文獻中整理出的原始資料，對討論的每個議題予以資料統計、排列比對、量化分析，然後揭示清末以來一百多年澳門教育發展的歷史狀貌及變化軌跡。作者將沉睡在檔案文獻中的資料喚醒，讓大量詳實的數字活動起來，開口說話，真正使自己的研究做到不僅“有（數）據可依”，而且“言之有（數）據”。全書使用近60個統計表格（各章均有），用資料讓研究的議題顯得更形象直觀，一目了然。以該書〈前言〉為例，在介紹20世紀20年代澳門教育概況時，作者從1925年和1927年的《澳門年鑑》中發現一些珍貴數據資料，然後根據年鑑列出的學校名錄和學生人數，整理出1925年澳門共有107所華人學校和5,987名學生兩個

<sup>①</sup>鄭振偉：《百年樹人：清末以來的澳門教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4年，頁56。

<sup>②</sup>鄭振偉：《百年樹人：清末以來的澳門教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4年，頁61。

<sup>③</sup>鄭振偉：《百年樹人：清末以來的澳門教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4年，頁63。

重要數據。另據作者統計，1925年《澳門年鑑》記錄的較具規模的華人學校有12所，分別是澳門英文學校、德華學校、華僑公立免費學校、蓮峰義學、鏡湖義學、孔教學校、覺覺學校、佩文學校、崇實學校、務本學校、齊民學校、公教學校。而這12所華人學校的學生共計2,284名，約佔澳門學生總數的38%。故此，作者得出“澳門當時的主流學校仍然是那些私塾式的舊校”的結論。<sup>①</sup>

個案分析是《百年樹人》研究的核心架構。全書每章均就某典型個案予以研究，從各個個案探究中揭示社會發展的時代印跡。書中的個案既彼此獨立又相互關聯，且共同構成清末以來澳門教育的發展歷史。如該書第八章〈師資培育：中國語文師資培育近況述評〉，以中國語文科師資培育為中心，綜論澳門回歸以來各高等院校和機構持續提供中國語文培訓課程，關注相關課程能否提升在職和非在職學員在學科知識和教學方面的素養。作者追根溯源發現，20世紀80、90年代澳門中小學師資的學歷普遍偏低，本地和外地的院校或機構於是開始提供證書或文憑課程。回歸後，澳門特區政府教育部門在中國語文科師資培育和培訓方面擔當着重要角色；教育暨青年局積極完善澳門的教育法規，明確教師的義務和權利，為語文科教師創設有利的專業成長條件，推動中國語文學科在課程和教學方面的改革，制定長遠的語文教育政策。這些舉措極大地提升了教師的中國語文專業素養。作者的這種個案研究方法，既能就某個專門問題展開透闢闡析，亦能以小見大地呈現歷史發展的多重面向。

第三，文獻史料力求廣博。《百年樹人》在文獻搜集與史料運用方面力求中西兼顧，精益求精。作者徵引的文獻極其豐富，既有學術著作、期刊論文、研討會論文等各種學術研究成果，又有政府公報、法令規章、官方檔案等政府文獻，還有學校校刊、校慶特刊、學生刊物等核心史料，以及報刊所載新聞報導、招生廣告等輔助史料，更有作者通過田野調查和人物訪談獲得的口述史料。以引用的報紙為例，作者廣泛查閱了不同語種、不同地區的大量報紙。語種方面，如葡文報紙有《澳門之聲》(*A Voz de Macau*)、《葡國畫報》(*Ilustração Portugueza*)等；英文報紙有《孖剌西報》(*Hong Kong Daily Press*)、《士蔑報》(*Hong Kong Telegraph*)、《德臣西報》(*The China Mail*)等。地區方面，如澳門的《澳門日報》、《世界日報》、《華僑報》、《新生報》等；香港的《大公報》、《華僑日報》等；新加坡的《南洋商報》等。文獻史料的廣泛運用，使作者的研究真正達到了“論從史出，史論結合”。

特別值得提出的是，作者注重發掘葡文史料。迄至今日，研究澳門教育的中文著述甚少使用葡文文獻。此乃澳門教育研究之一大缺憾。《百年樹人》不僅全面地搜集了許多相關的中文文獻，而且廣泛開掘並充分發揮葡文文獻的史料價值。作者使用的葡文文獻主要有：澳門檔案館的原始文件；《澳門憲報》上刊登的有關學制、課程、學校章程、校務報告、學校考試之類的原始史料；文德泉(Manuel Teixeira)神父的《澳門教育》(*A*

<sup>①</sup> 鄭振偉：《百年樹人：清末以來的澳門教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4年，頁7。

*Educação em Macau*) 所輯錄和整理的各類資料；歐禮諾 (Aureliano Barata) 的《1572 至 1979 年間的澳門教育——貢獻自己的歷史》( *O Ensino em Macau, 1572–1979: Contributos para a sua História* ) 及該書附錄中 1836 年至 1974 年的 39 種原始文獻；施愛萍 (Albina dos Santos Silva) 等編纂的三卷本《澳門教育歷史文獻》( *Documentos para a História da Educação em Macau* ) 收錄的各種與教育相關的法律文本、工作報告、各級教育組織章程等。這些葡文史料的廣泛開掘，使作者的研究達到“兼聽則明”、“不偏不倚”之效。

第四，學術觀點不乏新見。清末以來的澳門教育百年史，與中國近現代歷史，特別是近現代教育發展密不可分。故此，《百年樹人》以四百多年中西文化交流史和中國現代化發展進程為敘事背景，通過對澳門教育百年發展史上的若干典型個案予以精深解析，呈現出澳門教育發展的個性特徵。作者不僅讓文獻甦醒，讓數字說話，而且透過表層揭示本質，闡發一些頗具新意的學術觀點。

以該書第一章〈華洋並存：清末民初澳門本土的教育活動〉為例，作者在詳細介紹西方傳教士、土生葡人和澳葡政府為本地居民提供基本教育的情況後，明確指出“晚清時期的澳門雖然受到葡人的管治，但澳門與內地教育仍是一脈相承的”。<sup>①</sup>其後，作者還在“小結”部分更進一步闡明，“晚清時期（澳門）的華人教育仍然承襲着傳統的義學和私塾制度，用的是《三字經》和四書五經之類的教材，但晚清教育制度的改革和政局亦影響着澳門學校的發展”。<sup>②</sup>再如第九章〈教育研究：回顧三十年來的澳門教育研究〉，作者開宗明義：“澳門當代教育發展的一個明顯軌跡，是政府從撒手不管到介入再到積極參與私立學校的教育。”<sup>③</sup>這一觀點便給澳門百年教育發展歷程確定了基調。

當然，誠如作者在〈前言〉提到，《百年樹人》並不是宏觀的歷史敘述，更不可能面面俱到。此可謂該書留下的一點遺憾。但總體而言，《百年樹人》對澳門百年教育史若干議題頗有深度的挖掘，對檔案文獻史料不遺餘力的開鑿，無疑是對澳門教育史研究的全新貢獻。

<sup>①</sup> 鄭振偉：《百年樹人：清末以來的澳門教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4 年，頁 39。

<sup>②</sup> 鄭振偉：《百年樹人：清末以來的澳門教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4 年，頁 54。

<sup>③</sup> 鄭振偉：《百年樹人：清末以來的澳門教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4 年，頁 280。